

第一章

从陆军到海军

老战士面临新课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衡宝战役的炮声刚刚停息，我在长沙突然接到军委的电报，说毛泽东主席召见我，有要事面商。我只带着一个秘书，急忙启程，赶到北京，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解放饭店”。随后，我便去中南海拜见毛主席。

毛主席非常高兴。他说，解放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一支空军和一支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同志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我们想让你来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并听听你的意见。

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便坦率地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我晕船挺厉害，

连海船都坐不得。我这辈子总共坐过五六次海船，每次都晕得不轻。毛主席笑着说，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成天出海！停了一会，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二十多年来，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了，派谁去当司令员呢？你俩懂得我军的传统，又在苏联学习过。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们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我看，选定你们来当司令，还是合适的。他还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要搞海军，就总得有个人去领头。听了主席一番话，我就不便再说什么了。毛主席嘱咐我，回长沙后，继续抓好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调海军的事等待中央的正式决定。

十二月中旬，毛主席在赴苏联访问的前夕，又一次召见了。他说，这次出国访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会谈中，将会涉及苏联对我国的援助，其中也包括海、空军的技术装备。他征求了我对解决海军装备的意见，并询问了我所知道的苏联的一些情况。他强调指出，当时世界上愿意真诚援助我们的大国只有苏联。我们要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在海军建设过程中

要很好向苏联海军学习。

几天以后，林彪从广西前线返回武汉，在长沙逗留时，告诉我：关于我调海军的事，中央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有的领导同志还有不同意见。中央也曾打电报给四野领导人征求意见。四野领导原先打算让我留在中南地区任军区司令员。他说，现在还有两种可能：一是到海军去，一是留在中南地区。

对我个人来说，留在中南地区情况熟，干部也熟，工作起来会顺当一些；到海军去，一切从头学起，如何打开工作局面，一时心里还无头绪。何去何从，当然只有等待中央的决定。

又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了电报。电文中说：“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调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为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允许由原兵团直属队抽调部分机关与干部，以作为海军直属机构之基础。”紧接着，军委又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发布了任命我为海军司令员的正式命令。这样，我到海军任职的事就正式定下来了。

这是一道崭新的课题，而且是一道难题。当时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曾经扬言：“共产党要想建设海军，无异是痴人说梦！”这当然是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狂妄之词。但是，我当时遇到的困难，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大极了！

困难首先来自缺乏知识。几十年中，我都是在陆军部队工作。青年时代，两次赴苏联学习军事，也都是学的陆军部队科目。除了到波罗的海苏联的一艘巡洋舰上去参观过一次训练外，从没接触过海军。海军由哪些兵种组成？海军需要哪些武器装备？各国海军的过去和现状怎样？海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些什么？建设海军应该从哪一环入手……一句话，对搞海军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不但我是这样，所有来自陆军的同志，也都是不懂海军，一时不知怎样开展工作。

困难还来自我国海军的基础是那样薄弱。我国是一个有着长达一万八千多公里海岸线和辽阔海区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大都来自海上。我国的领海长期处于有海无防的屈辱境地。清朝末年，虽然建立过一支有一定规模的海军，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指挥上的无能，北洋水师、福建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法马尾海战中，先后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国民党组建起来的海军，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也几乎损失殆尽。抗战胜利后，在美英的援助下，它又重建海军，但搞了几年，建设起来的海军也可怜得很，武器装备大都破烂不堪。至于人民海军，在我受命组建海军的时候，华东军区海军刚刚组建起来半年多。这是我人民海军的第一支部队。张爱萍同志在负责组建这支部队时，也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克服了许多困难。他们拥有的装备只有接收国民党海军起

义、投诚的一些舰艇，不但质量差，数量也不多。华南地区和青岛地区的海军，架子都还没有完全搭起来。没有军舰，没有油水补给船，没有飞机，没有海岸炮，缺少象样的码头、机场，也缺少油料和各种物资。国家底子薄，经济非常困难，拿不出多少钱来搞海军建设。我从长沙来到北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不得不在旅馆里歇宿。两个月后，我到了威海，要过海到刘公岛去察看，但是没有船，只好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小船。渔民说：“你是个海军司令员，还要租我们的渔船！”这话对我刺激很大，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海军司令，真是两手空空啊！

困难也来自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斗争形势。一九五〇年初，大陆上的解放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但东南沿海的岛屿尚未解放。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他们还暂时拥有的海、空优势，一面对我实行严密的海上封锁，一面天天派飞机来对我进行狂轰滥炸。刚刚开始组建的人民海军，不但要同敌人的骚扰破坏进行频繁的斗争，而且担负着解放沿海岛屿，同时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繁重作战任务。及至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朝鲜，并命令第七舰队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我国沿海斗争的形势就更趋紧张了。我们不但要随时准备粉碎来自东南沿海的美蒋反动派的侵略和袭扰，还要严密监视朝鲜战争的发展局势，警惕来自北部海域的侵略，保卫祖国首都的安全。这种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我们不可能按部就班地进行建设，

只能是一边打仗一边建设，哪项任务紧急就先抓哪一项，许多事情办起来，就显得特别棘手。

当然，在另一方面，有利条件也是有的。这主要是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坚决支持，有各地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还有，就是有苏联的热情帮助。从陆军调来的大批干部，虽然不懂技术，但是政治素质好，觉悟高，只要工作做得好，把他们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正是怀着这种既感到任务艰巨，又满有信心的复杂心情来到海军的。要说是当时有点艰苦创业的雄心壮志，也是可以的。

一九五〇年一月下旬，我正式移交了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离开长沙，到了武汉，逗留十余天，于二月中旬抵达北京，开始了我在海军任职三十年的工作历程。

在武汉，长江水面上分散停泊着几十艘海军舰艇。它们是华东军区海军当时的主要战斗力量，即海防第一、第二两个舰队（相当于后来的支队）和江防舰队，是从长江下游疏散到这里来防空的。我登舰看望了舰战员们，并进行了初步调查研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们自己的舰艇，那种兴奋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当时第一、第二舰队各有护航舰、炮舰和登陆舰十来艘，江防舰队有小艇三四十艘。舰队负责人肖平、陈绍海等同志向我详细汇报了这些舰艇的性能以及武器装备、人员编

制等情况。我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还给大家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检查海军部队的工作，也是我学习海军知识上的第一堂课。这种学习方法很实际，既熟悉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又耳闻目睹了过去不知道的许多新知识、新事物。真是一举两得！

到北京以后，我在忙于处理筹建工作的同时，继续想方设法学习各种海军科学知识。当时采用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向苏联专家请教。有时是主动向他们请教某一问题，有时结合商谈工作进行学习。交谈得较多的是有关武器装备和码头、基地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使我在这些方面逐渐增长了知识。另一个是找部队的负责人来汇报工作。记得最早来交谈的是赵汇川同志。他当时是华东海军的作战处长。他向我全面谈了华东海军组建以来的详细情况。这样，就使得我对于部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摸到了海军建设的“家底”，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知识。

前面已经提到，当时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渡海作战，第一位重要的任务，当然要海军来承担。这样，我受命伊始，屁股还没有坐稳，就不得不首先抓这件事。要准备打仗，当然首先就要摸清敌我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通过阅读敌情资料，找国民党原海军的一些高级军官交谈等办法，我首先对台湾海军的实力和作战的特点，有了概略的了解。接着又了解我军的情况，

组织人员计算了登陆作战所需要的舰船数量和物资储备。在这方面，当时担任华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粟裕同志，给了我有力的帮助。解放台湾是华东军区面临的首要任务，华东军区海军的组建又一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所以那时他比我更了解华东海军的情况。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一日，我们在一起专门商谈了攻台的准备工作。海军各种类型的舰船有多少，能参加渡海作战的有多少，打算出动多少舰艇担任战斗和护航任务，多少舰船担任运输任务，如何搞好战前训练，准备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等等，他都讲得很清楚。随后，我又抓紧时间，突击学习了指挥登陆作战的有关知识。这样，忙了几个月，直到六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延期解放台湾的决定后，这方面的紧张工作才逐渐缓和下来。

这年冬天，当一些最迫切的工作大体就绪以后，为了探索海军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专程到苏联去进行了一次考察。我们是十一月中旬启程的。我们一行，由苏联派来我海军任首席顾问的库兹敏陪同前往。但火车在开往西伯利亚途中，他得了阑尾炎，被留在当地动手术。我们抵达莫斯科以后，苏联海军派了一位副司令员陪同我参观访问。在列宁格勒，我们参观访问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些军舰，看了在十月革命中炮击冬宫的著名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观了列宁格勒海军学校。那时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四五年，苏联海军也还很困难，武器装备比较落后，

最大的军舰还是几条老巡洋舰。可能是怕我伸手要装备，他们专门安排我去参观了列宁的一个造船厂。这个所谓造船厂，简直不象样子，几幢很简陋的房子，座落在一片废墟上，周围到处堆积着瓦砾和废钢铁。尽管如此，当时苏联领导人和广大群众，对我们是很热情的，只是他们也确有困难罢了。我很理解这点，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

除了参观，我还走访了苏联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和部队负责人，请他们介绍苏联海军建设情况，分析世界海军的发展形势，谈他们对海战中一些重要战术原则的看法。先后同我交谈的有十多人。有的向我介绍国际领海的有关规定；有的介绍英、美海军的发展趋向；有的谈海空军的编制原则；有的谈潜艇在海军中的地位；有的谈海岸防御工程和兵力部署；有的谈登陆战的作战指挥；还有的分析介绍了苏联海军在政治、后勤、干部等方面的建设情况，等等。

这次赴苏考察访问，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实际的学习。它不仅使我比较系统、全面地学到了一些海军科学知识，也使我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我国海军建设同世界上那些大国海军建设的巨大差距。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要发奋图强，把人民海军尽快建设起来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

在我受命组建海军领导机关以后，首先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海军领导机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一个战略决策单位还是军委总参的一个业务部门？是一个军种，还是一个兵种？二是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哪里？是设在北京，还是设在沿海的某一个城市？这两个问题不明确，不仅当时的许多筹建工作难以进行，而且关系到海军的长远建设。

我在考虑这两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苏联和美国海军的情况。它们都是大国，它们的海军都有各自的独立系统和领导机构。我国也是个大国，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海军的建设必须从长远着眼，而不能只顾眼前。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坚持海军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军种，而不能是一个兵种，更不是一个业务部门。海军领导机关应该设在北京，这样才能同党中央和军委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得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同时，从海军的业务范围来说，与政务院许多部门，如外交、交通、水产、科委以及各工业部门，都有密切关联。设在北京，才便于及时洽商，及时解决问题。但是，有的高级领导同志却认为，海军可以算作总参的一个部门，没有必要成立独立的领导机关，只要建立一个小小的领导班子就行了。有的主张，

海军领导机关不设在北京，可以放在青岛、天津或别的沿海城市。

这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苏联访问。我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聂总往莫斯科给毛主席挂了长途电话。事后，他告诉我，毛主席回话说，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这样，这两个问题才算明确下来，筹建海军领导机关的工作便逐步展开。

但是，意见并没有完全统一。直到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宣布成立以后，有位高级领导干部，还主张海军只是一个附属机构，而不应该单独成立领导机关。有的坚持说，海直机关应该离开北京，搬到青岛，与青岛基地合并成一个机构。为这事，我又当面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问：“你们机关搞了多少人？”我回答说：“大约九百人。”毛主席听了，说：“人不多嘛。海军是个决策单位，应该在北京。没有房子，可以自己盖，你们写报告，我们来批钱。”

没有房子，在当时的确是个难题。偌大个机关，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嘛。北京解放一年多了，原有的公房，几乎全部让先进城的部队、机关住满了。在还没有定下海直机关设在哪里之前，我就派当时十二兵团供管处长景宜亭同志带着二三十人，先期到来。他们编成三个小组，两个组到天津、青岛，一个组留在北京，为成立海军领导机关找房子。在天津、青岛都很快找到了一些房子，唯有北

京确实难找。直到一九五〇年二月中旬，我从长沙经武汉到达北京后，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后来还是通过政务院的有关部门，调拨给我们几处房屋；我们又花一笔钱买了一些私房，还租了几家旅馆，这才让先后到来的一些干部、战士住了下来。我开始住在东城的麻线胡同，不久搬到北新桥的大头条，在一个小院里，一直住了近三十年。司、政、后等机关和一些部队，分散住在西堂胡同、西观音寺胡同、官帽胡同、王家胡同、广宁伯街等处，几乎遍及半个北京城。后来，私房也买不到了，这才写报告，由周总理批款，在建国门内的一个叫贡院的地方盖了几座楼。从此，司政机关才相对集中起来，在一处办公了。

应该说，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哪里的问题，在当时是解决了的。但是，直到一九六三年，有位中央领导同志仍然重提这件事。他建议海军领导机关还是离开北京，搬到青岛或旅大去。我们不得不召开了一次党委会，就这事进行讨论。大家认真分析，权衡利弊，认为：迁到沿海城市去，固然有一定的好处，如靠海，接近部队，还有利于战略疏散。但迁出去，远离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各业务部门，许多事情实在不方便。我们对世界各主要海军国家海军领导机关的地理位置，进行了统计，发现除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很少几国以外，其余如苏、美、英、法、日本、西德、印尼、印度、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军领导机构，都设在首都。我们以海军党委的名义，给军委、

总参和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报告，提出“海军领导机关不迁为好”。打这以后，才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

我把这个问题的始末如实写出来，只是为了说明，在海军初创时期，确定某些问题，都有个统一认识的过程，有的甚至要反复几次，持续很长时间，才能消除分歧，最后确定下来。

根据军委的决定，组建海军直属机构，主要从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直属队抽调部分机构和干部。抽调多少呢？上面规定的总的原则是，既要考虑海军建设的需要，又要保证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领导工作不受太大影响。我和黄克诚等同志商量。他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军区政委。按军委指示，我调离湖南以后，军区司令员也由他兼任。他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认为，组建海军是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需要抽调多少就抽多少，需要调谁就调谁去。随后，我又同干部、军务部门的领导同志商量，决定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来海军。科以上干部的名单，是由我逐个审定的。各科的干部则由科长们商定。随后将名单上报第四野战军领导审批，才最后确定下来。

当时调来海军的有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之司令部（含通信队）三百余人，政治部（含宣传队）二百余人，兵团卫生科及供管处全部三百余人，军政干校约七百人，还有警卫团两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总共两千余人。其中一

部分来到北京组建海军直属队，其余都到青岛筹建后来的青岛基地。当时的海军后勤部，主要是以四野后勤二分部的人员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到一九五二年，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军部的部分机构和人员，又调来充实了海直机关。

海军领导机关需要设立哪些部门呢？最初我们还是沿用陆军的编制，只设立司、政、后、卫四大部。司令部由罗舜初任参谋长，下设作战、情报、机要、军训、军务、炮兵、通信、组织动员、管理等处；政治部由刘道生兼任主任，下设组织、宣传、保卫、文化、青年等二级部；后勤部由张汉丞任部长，丁世芳为卫生部长。当时机构比较精悍，办事效率也比较高。有什么事情，常常采用集体办公的方式，几个领导人凑在一起一商量，定下来就分头去执行。

一九五〇年的三月底、四月初，各路人马大体到齐。四月十四日，经报告军委同意，我们正式召开了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地点是借用的当时协和医院的礼堂，在北京的海军人员差不多都到会了。

我在会上讲了话。在讲话之前，我考虑了许多问题，写下了比较详细的讲话提纲。我讲了中国为什么要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分析了建立这支海军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对于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海军，我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想法，只是讲了这样几点：我们要建立的是一支自卫的、防御的海军，而不是一支侵略别国的海军，要

纠正那些单纯同英、美等海军强国比吨位的思想；我们的优越条件是靠近海岸，有众多的岛屿，要充分利用这个优越条件，把每一个岛屿变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把每一座海岸炮当作军舰上的一门主炮；我们这支海军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却是进攻的；我们不建重型的舰队，而是要建立起一支轻型的舰队。这些想法，是后来制定海军建设方针的一个雏形。

在讲话中，我还强调说，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固然要重视物质条件的建设，要设法解决武器装备，建设基地、码头、阵地；但同时，还要重视建政治、建思想、建作风，要从各个方面打好海军建设的基础。我们要建立的是革命的海军、人民的海军，要用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海军建设。要保卫我们民族的利益，但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要保卫中国人民安全、中国国土的安全，同时，还要保卫世界的和平民主。这样的海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建党，把人民海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还要从战斗中来建设这支海军。这是因为：一方面，建设海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作战，离开战斗来谈海军建设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很繁重，我们只能一边打仗，一边建设。边打边建，双管齐下。最后，我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海军建设的几项紧迫任务：一是把现有战斗力量很好组织起来，参加海、陆两栖

作战；二是开办学校，抓紧培养海军建设干部；三是要把一些重要的基地、码头、阵地等等尽快建设起来；四是要树立适用海军建设的新的思想、作风。

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有了一个军种，管理和指挥全国各地的海军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在海军领导机关宣告成立的时候，中央军委只任命了我和刘道生同志两位海军领导人。在四月下旬，军委任命了王宏坤同志任海军副司令员，随后又于六月任命了罗舜初同志为海军参谋长。王宏坤过去长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抗战初期，他任三八五旅旅长时，同我有过短时间的接触。渡江战役前，我率十二兵团进军武汉时，他任桐柏军区司令员，又同他配合作战过一两次。调来海军前，他是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罗舜初过去也同我有过交往。解放战争时期，我和他都在东北野战军工作。部队南下时，他在十二兵团四十军先后任政治委员和军长。一九五二年三月，他被升任为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由周希汉同志接替他任海军参谋长。周最初也是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到海军前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军长兼滇南卫戍司令员。一九五三年二月，原任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的方强同志，调海军任副政委后改任第三副司令员。我对他也是比较熟悉、了解的。长征期间，他在红军干部团团部工作，我任该团上干队队长。他受组织委托，曾为恢复我的党籍办理过组

织手续。抗日战争后期，他曾一度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们有过接触。他调中南海军工作以后，彼此工作上的往来就更多了。这年十一月下旬，苏振华同志调来海军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七年二月升任海军政治委员）。解放战争后期，他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委员，来海军前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上就是海军初创时期的七位主要领导干部。大家都怀着建设强大海军的共同目的，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来到了海军，组成了海军的领导班子，同广大指战员一道，为海军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光阴荏苒，一晃就是二三十年。其中多数同志的后半生都是在海军度过的。今天，有的已经辞别了人世，长眠于地下，健在的也都已离开海军领导岗位。这些同志，尽管各自都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以至错误，也不管彼此之间有过什么争论和分歧，但他们为创建人民海军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想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创办第一所正规海军学校

还在我刚刚受命组建海军的时候，即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我在北京遇见了后来任海军参谋长的张学思同志。学思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同父异母兄弟。在时代洪流的冲击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他在青年时代就成了封建军阀家庭的叛逆者，到了延安，走上了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

争道路。我和他相识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我们曾一度都在南满坚持斗争。当时他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和辽宁军区司令员，随后又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主任。在“四保临江”战役中，他率领群众和地方武装，支援、协同主力部队作战，做了许多工作。现在，又在首都重逢，彼此都很高兴。

学思告诉我，从这年夏天开始，他就奉军委之命，在原安东海校的基础上，负责筹办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军委派他赴苏联进行了一次考察，参观了几所苏联海军学校，还聘请了一批苏联技术专家来帮助我们办校。九月中旬，他刚从莫斯科回国。他说，他得知军委要我来筹建海军的消息很高兴。军委原打算让他担任大连海校的校长。他认为建军和建校历来都是一致的，由司令员兼任学校领导，许多事情都比较好办。他打算报请军委任命我兼任校长。

大约一个月以后，军委果然作出了决定，任命我兼任大连海校校长和政治委员，张学思同志为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当时由于海军领导机关尚未成立，我也没有到职，许多工作都是由军委总部直接部署，东北军区具体领导，张学思同志负责筹办的。经过学思四处奔波，又与苏联顾问多次商议，并报经军委审批，学校的校址、学制、教员配备、招生人数等等问题，都先后得到了解决。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大连海军学校正式开学了。

三月中旬，我第一次听取了海校情况的汇报。当时学

校的负责人，除我和学思以外，还有政治部主任李东野同志。他原先就和学思一起，在辽宁省军区工作，两人关系很融洽。全校有苏联顾问八十多人，是协助我们办学的一支不小的力量。教员除由“重庆”舰起义军官十六人担任以外，还从大连大学聘请了十几位教授兼任。开始，学员只有二百余人，分为速成班和普通班。速成班的学员是从地方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选拔的，普通班的学员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不久，改按专业分为航海指挥和机械工程两个系，每系按文化程度分为两年和三年两类不同的学制，每类又按具体专业分为若干班次，分别培养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机电等水面舰艇的干部。

四月中旬，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大会刚开过，我就从北京赶到大连海校。学校的校址座落在大连老虎滩风景区的一侧。这里在日军侵占大连时，曾是一批外国显贵们享乐的地方。苏军解放大连后，在这里驻着一个炮兵团。张学思同志在勘察校址时，选定了这个地方，又费了很大的周折，通过外交途径，让苏军搬迁出去。我到达时，校舍已经进行了初步维修，面貌焕然一新了。

在海校，我和学思等同志就如何把学校办好进行了商议。我还分别召集处、系领导干部和教员进行了座谈。四月二十二日，向全校教职员工讲了一次话。

学校刚刚办起来，困难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干部，其中又主要是缺教员，特别是缺有

海军科学知识的教员和一定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此外，由于苏联顾问多，翻译也显得严重不足。二是缺经费，缺教学器材。例如，当时需要实验室三十余个，已建成的只有十二个。实习用的军舰、枪炮、无线电器材等等，都很缺乏，有的根本没有。面对这些困难，我一方面勉励全校师生员工要迎难而上，自力更生，艰苦办校；另一方面，也及时向军委、总部反映，积极设法帮助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例如，通过中央和政务院有关部门，向地方院校要求支援。仅一九五〇年底，便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大学等高等院校，招聘了三十多名高年级学生和计算机专家慈云桂等来校担任教师。我还通过湖南军区，从湖南大学招聘了光学博士曹懋修、数学教授余潜修等许多名高级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在中央和地方的关心、支援下，翻译人才也陆续得到了补充。经过洽商，从苏军驻大连的消磁站接收了一大批航海仪器、帆缆船舶设备及通讯联络器材，供学校用于教学。至于缺经费的困难，则主要是报经军委、总部陆续拨款，逐步得到解决的。

在向全校教职员工的讲话中，除了谈到建设人民海军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针、任务以外，我着重谈了关于学校建设的几个思想问题。一是强调了要树立以教学为中心、为学员服务的思想。学校是以培养干部为目的的，学员是主体，其他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教学进行，要从提高教学质量着想。二是指出要正确处理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

是主导，技术是从属。技术可以发挥政治力量，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技术学习。政治与技术，两者必须结合，不可分离。三是讲了发扬优良传统和学习苏军经验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我党我军的优良思想、作风是基础，必须很好继承和发扬，但又必须虚心学习苏联海军办校的先进经验。四是强调学校工作既要坚持说服教育，但又必须严格纪律和制度。五是要求全体学员要端正学习态度，树立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而愤发图强、刻苦学习的思想。

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我再次来到大连海校。这时学校已经开办一年多了。各项建设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基础。以原有的航海指挥和机械工程两个系为基础，全校已经扩编成一、二两所分校。教学设备不断得到充实，教学组织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正规的制度，一套相当充分统一的教材已经编译出来，各项保证工作基本落实，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学员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看到这种蓬勃向上的景象，我心里很高兴。在与总校和两所分校负责人交谈时，我赞扬了他们那种艰苦奋斗、严格治校的工作精神；在教授座谈会上，我赞扬他们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在与苏联专家交谈时，我也对他们的热情援助表示了深切的谢意。四月三日，我又对全校教职员工讲了话，要求大家共同努力，贯彻巩固提高的方针，在现有基础上，把教学工作搞得更好，为人民海军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水面舰艇干部，积极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九五二年春，原在十军工作的刘华清同志也被调到总校任副政治委员。第二年初，张学思同志调任海军副参谋长以后，刘华清任副校长兼副政委，主持学校工作。我虽然还挂名兼任校长，但由于海军建设的摊子大了，大连海校的许多实际工作，便过问得少了。

大连海校的组建和发展，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除了建校初期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军委直接过问定下来的、在办校过程中又帮助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以外，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还多次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工作。一九五二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在大连时到校视察了校容，还接见了张学思副校长，并乘坐了学校实习用的炮艇。一九五三年九月，朱德同志也来校视察，检阅了全校教职员工，会见了苏联专家，听取了学校建设情况的汇报，观看了教学设备，还为学校题词，勉励大家“努力掌握现代海军作战技术”。彭德怀、刘伯承等同志也都先后来校视察过，给了全校人员以巨大的鼓舞。

一九五四年四月，总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奉命撤销。两所分校分别被命名为海军指挥学校和海军机械学校，各自独立办学，继续培养海军舰艇干部。在为期四年的过程中，大连海校先后培训出各类学员六百六十余名，分期分批地被输送到海军的舰艇部队，成为我们自己培养的第一批舰艇部队建设的领导骨干，其中不少学员还先后担任了海军各级重要领导职务，为海军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创办大连海校的同时，从一九五〇年五月开始，我还抓了青岛地区的几所学校，即航空学校、炮兵学校、鱼雷快艇学校的筹建。十月，又将原华东海军所辖海军学校，扩建为海军联合学校，并划归海军直接领导。当时为筹办这些学校选定校址、抽调干部以及解决学员来源和办校经费等等实际问题，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为什么海军创建伊始，大量工作都还没有开展的时候，我就首先要抓学校的建设呢？一方面，这是在贯彻军委的意图。海军还没有组建起来，军委就想到筹办大连海校；另一方面，我从自己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深知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重要。青年时代，我两次赴苏，在学校学习六年，回国后又在中央苏区的军政学校和红军大学工作过。在延安，到抗大等学校讲过课，又筹办过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军政干部训练班。现在要创建新的军种了，干部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而学校正是培养干部的摇篮和基地。海军是一个技术非常复杂的军种，需要大量具有多学科知识的人才。不抓干部的培养，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海军的建设就无从谈起。因此，我当时提出要“治军先治校”，宁可其他工作往后推延一下，也要先把培养干部、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抓起来。随后，海军党委还提出“学校工作是海军建设的中心的中心”。这些提法，无非是要强调建设学校，强调培养干部和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这不仅在海军

建设的初期应该如此，在海军建设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我觉得，也仍须高度重视干部和人才的培养。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jh.com